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YIDAIYILU JIANSHE YU

ZHONGGUO GUOJI HUAYUQUAN TISHENG

陈宗权 ○ 等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陈宗权 ○ 等 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陈宗权等著.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504 - 3101 - 0

I. ①—… II. ①陈… III. ①“一带一路”—关系—国际新闻—
新闻语言—研究—中国 IV. ①F125②G210③G21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2106 号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陈宗权 等著

责任编辑	王利 李晓嵩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	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 - 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印 张	6.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04 - 3101 - 0
定 价	48.00 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国际话语权：概念释义及理论基础 / 9

第一节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综述 / 9

一、国外研究综述 / 9

二、国内研究综述 / 12

第二节 话语及话语权 / 22

一、福柯的“话语”及“话语权” / 22

二、“话语权”释义 / 27

第三节 国际话语权：概念、形成机理及其类别 / 29

一、“国际话语权”概念解析 / 29

二、国际话语权的形成机理及其类别 / 33

第二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话语权

提升 / 52

第一节 国际经济形势及经济话语权格局 / 52

- 一、总体世界经济形势 / 52
- 二、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话语权问题 / 54
- 三、美国经济话语霸权的衰落 / 57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行为及实践 / 58

-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内容 / 58
- 二、基础设施建设 / 61
- 三、国际产能合作 / 69
- 四、商贸往来 / 76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经济话语权的 战略思考 / 86

-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 / 86
- 二、对策及建议 / 89

第三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制度话语权 提升 / 97

第一节 从战略高度认识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性 / 97

- 一、制度话语权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重要性 / 98
- 二、中国提升制度话语权对世界的重要意义 / 102

第二节 制度话语权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建设 / 106

- 一、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107
- 二、“一带一路”的制度内涵及其实践 / 115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的战略 思考 / 121

- 一、“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的制度话语权 / 122

-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 127
-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的对策 / 133

第四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文化话语权提升 / 137

第一节 国际文化格局与中国文化话语权现状 / 138

- 一、当今国际文化格局 / 138
- 二、中国国际文化话语权现状 / 141

第二节 民心相通与“一带一路”的文化实践 / 145

- 一、“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目标 / 146
- 二、“一带一路”对多元文化话语权的推动 / 149

第三节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的 路径 / 153

- 一、为什么要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 / 153
- 二、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 / 156

第五章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自信 / 166

第一节 自信和国家自信 / 166

- 一、“自信”的内涵释义和“国家自信”的历史阐释 / 166
- 二、对内层面的国家自信 / 168
- 三、“一带一路”与对外层面的国家自信 / 170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经济自信 / 172

- 一、中国开放、包容、互利的经济建设态势 / 172
- 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及所承担的经济责任 / 174
- 三、建构新型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自信 / 175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制度自信 / 177

- 一、“一带一路”制度设计与新型全球治理结构 / 177
- 二、“共享型”世界秩序的设想及中国的制度贡献 / 178
- 三、制度性公共产品凸显中国责任与中国自信 / 180

第四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文化自信 / 181

- 一、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精神表达 / 182
- 二、中国文化自信的基因 / 183
- 三、“一带一路”建设中互鉴共存的文明意识与中国自信 / 185

参考文献 / 188

后 记 / 201

导 论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持续推进使得国际关系与国内局势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联动，人类日益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中。随着西方国家深陷内外困境以及新兴国家的集体崛起，国际格局正从“冷战”结束初期的单极状态向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过局部的动荡和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大大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国家之间综合国力较量日益激烈，特别是大国围绕国际规则和话语权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西方国家希望借助既有的制度规则维护其垄断性的优势地位，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要求改变国际权利和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思潮上，“冷战”结束之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潮流出现阶段性停滞，以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全球化为特征的各类极端主张纷纷在世界范围强势登场。

在国际关系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的需求与供给出现重大失衡。“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导致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大量全球问题正在危及人类的生存及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需求上升形成反差的是，治理全球问题的公共产品

供给严重不足。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治理的规则和议程。然而，当前，美国和欧洲继续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均在下降。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改革与重建，美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但政治极化问题依然严重，社会和种族矛盾持续发酵，在对外行动上减少干预，全面内顾。欧洲近年来危机不断，债务困境、难民涌入和暴恐活动的多重冲击致使其一体化进程明显受挫，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力不从心，其对外政策的内倾化趋势也日益明显。其结果是全球治理理念、原则和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规则的供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落后于实际需求。^① 全球治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失灵和世界秩序的紊乱，极端伊斯兰国崛起、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危机等都是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失败的直接结果。

全球治理失灵呼唤新型的全球治理方案。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迫切需要超越西方治理经验，寻求新的全球问题解决之道。对此，中国领导人具有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考虑。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②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

① 秦亚青.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 (4).

② 习近平.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4-03-30 (2).

方案。^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庆祝大会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 由此可见，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和重心，不仅是中国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战略需要，更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长远之道。

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融入到引领的转变过程。相应地，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身份在中国的参与实践中实现了从一个体系外的革命性国家到体系内的建设性国家的重塑。^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敌视、军事封锁和外交孤立，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治理机制之外。相应地，由于游离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中国将这些治理机制视为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是推进世界革命的目标和对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之中，不仅加入了世界主要的治理机构，也签署了大量的国际规章条约，同时不断推进内部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以适应新兴的国际规范。这一时期，中国刚刚重返国际舞台，对现行的治理机制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全球问题的持续增加，中国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建立上

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②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7-02 (2).

③ 秦亚青. 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7.

海合作组织、推进朝核“六方会谈”等方式为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际国内大局，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提升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战略高度，主动谋划、积极作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倡议和新举措，开创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崭新局面。

在实践层面，经过近年来持续的战略投入和外交探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日益清晰。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国积极推动 20 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特别是在 20 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中国作为主办国，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主张，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提出了中国方案。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一方面努力推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主导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在世界发展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并全面履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自身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贫困地区的援助和投资力度，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责任担当精神。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进一步加大支持联合国维和事业的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调停，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推动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架构。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巴黎全球气候变化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以坚定的决心和强有力的领导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最为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从 2013 年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相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 2015 年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的政策文件，再到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盛大召开，“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从理念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和世界经济的面貌，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和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领导人站在实现国家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统筹国际国内大局所提出的指导中国未来数十年发展的大战略，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区域发展失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而且为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者”转变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方。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缓解全球治理失灵、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在物质层面，“一带一路”顺应了沿线国家寻求发展、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普遍愿望，重点加强基础设施、产能对接、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资金储备和丰富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同时撬动和动员国际社会资源，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道路、航空、海运、通信、网络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提供良好的设施保障。在产能合作方面，中国已经同数十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产能合作，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工程进展顺利，实现了中国制造业与沿线国家资源和劳动力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在贸易往来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大力实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战略举措，贸易成本大大降低，贸易总额实现快速增长。2014—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大幅增加，特别是中国与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合作区，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通过物质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力地改变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面貌，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

在制度层面，中国主要通过对现有合作机制的继承、整合与创新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继承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一方面加强双边合作，充分发挥现有的工作机制的作用，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强化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体系、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机制的作用。在整合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衔接与规则对接，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在创新方面，中国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积极打造新兴的合作平台，特别是创造性地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两大金融机构的建立和运行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领域公共物品供给的重大尝试，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和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通过对现有机制的继承、整合与创

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在文明层面，中国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人文精神。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商业扩张、殖民征服和对外战争确立起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构建出一套一元主义的文明观，即西方文明是普世性的，是通向人类繁荣进步的唯一道路。非西方国家只有放弃自己的传统价值，学习西方文明，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在这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对抗和冲突，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诸如种族矛盾、宗教纷争和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正是基于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在理念层面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同时基于全球化和人类相互依存的国际现实大力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努力超越霸权主导逻辑和零和博弈思维，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型发展道路。在实践层面，中国大力推进民心相通工程，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通过这些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国的道路、政策和话语日益被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理解、认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明交往中的话语权。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创新之举。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在物质合作、制度对接和文明交流三大层面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经济面貌和全球治理格局，推动着中国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显著提升。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建设毕竟是一个世纪工程，体系宏大、领域众多、规模空前，这一美好蓝图的实现绝非朝夕之功，而且存在诸多现实和潜在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将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基于此，本书从国际话语权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国际话语权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系统梳理“一带一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内在机理，并深入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及其政策应对。

第一章 国际话语权： 概念释义及理论基础

自从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话语即权力”命题以来，“话语权”就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成为多个学科领域持续性关注的一个论题。理论源于实践。“话语权”研究的兴起与现实中的各种话语权论争密切相关。“国际话语权”作为一个论题的形成也正是源于国际社会中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种种行为实践。国际话语权既彰显了一国的整体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也反过来促进着该国实力的提升。正如导论所述，“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正重新洗牌，中国的强势崛起必然导致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中国实现自身利益的要求。所以，加强对国际话语权的研究，既是理论建构的需要，也是实践的要求。本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对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及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和解析。

第一节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国外学界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

主要是从“话语权”这一本身概念入手，致力于从各个领域与角度解析“话语”的作用，探索“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涉及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传播学等在内的多个学科。

在哲学领域，最早将“话语权”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的是福柯，他深刻阐释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在福柯的观点中，话语权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而得以运作的，并通过语言的运用而得以体现，话语即权力。^① 在国际交往里，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拥有了决定国际社会舆论走向的权力。英国哲学家阿兰·谢里登（Alan Sheridan）延续了福柯的观点，对其观点进行了再次的梳理与解构，并进一步探讨了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观点。^②

在社会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和权力的关系。他强调语言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任何合法语言都是由国家体制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③ 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也认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息息相关，当代社会话语的使用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④ 加拿大学者阿德里娜·S.尚邦（Adrienne S. Chambon）、阿兰·欧文（Allan Irving）以及美国学者劳拉·爱泼斯坦（Laura Epstein）则从话语、权力

① J. 丹纳赫，等. 理解福柯 [M]. 刘瑾，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② 阿兰·谢里登. 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 [M]. 尚志英，许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③ 皮埃尔·布尔迪厄. 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 [M]. 褚思真，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④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